

立足数字经济是制度型开放的优选项

■ 姚为群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基础,除了其成本低之外,还有不受空间限制、更新速度快、互动性、个性化、受众广、存量大和多形式等优点,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是一种互补关系,不是一种替代关系。互联网又是属于全人类的,其以“包交换”的方式连接的分布式网络,在技术的层面上难以存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利益集团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的问题。反过来,也无法把互联网封闭在一个国家之内,但必须要有某种规则、方式来确定联入其中的每一台主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数字贸易”。《“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完善数字贸易促进政策,加强制度供给和法律保障。积极支持数字产品贸易,为数字产品走出去营造良好环境。持续优化数字服务贸易,进一步促进专业服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服务贸易业态创新发展。稳步推进数字技术贸易,提升云计算服务、通信技术服务等数字技术贸易业态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权和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数据贸易,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数据贸易模式。提升数字贸易公共服务能力。建立数字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加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布局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强数字领域多双边合作”。

众所周知,马克思将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流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将商品由物质转化为货币,使得商品价值在消费环节得以实现,商品生产者收回投资并使再生产成为可能,进而承上启下。发展数字经济更需要数字

贸易作为交换媒介,承担起商品和服务从生产到消费领域的“惊险一跃”功能。

2021年9月16日,中国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保存方新西兰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同年11月1日,中国向《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保存方新西兰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DEPA的书面信函,意味着中国将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积极探索制度型开放,立足数字经济

经济不啻是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优选。立足数字经济推进制度型开放,就要求在积极吸引跨国数字企业对华投资的同时,更加积极地推进中国头部数字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积极对外投资、扩大数字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的出口。

立足数字经济推进制度型开放,就要求中国企业在全球扩大跨境电商规模,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数字产业集群,推动诸边电子商务实质性谈判,让数字化改造国际贸易。

立足数字经济推进制度型开放,就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对接CPTPP、DEPA乃至全球最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探索可跨境数据的分类和存储的本地化,为加入谈判的顺利进行提供支撑。

立足数字经济推进制度型开放,就要求政府主管部门按市场需求,探索用集中拍卖方式推进数据作为商品的交易,以证券化的方式推进数据作为要素的交易,同时试点外商直接参与。

立足数字经济推进制度型开放,就要求立法和行政主管部门,基于联合国《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加快探索电子发票立法,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

立足数字经济推进制度型开放,就要求中国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以自贸试验区作为试验田,用最佳实践案例稳步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更多保障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的可复制、可示范的经验。

总而言之,立足数字经济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在流通,通过提升供给质量创造更多市场需求,通过优化分配释放更大消费潜力,通过打通关键堵点拓展更广交换空间,形成供求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作者系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苏州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向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综合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希望加入入境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试点。“我们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生物原材料,加入试点后,只需要对接联合监管机制办公室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效率。”该公司总监孙静说。

企业负责人所说的入境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试点是苏州自贸片区于去年年底积极推动的改革创新,通过优化特殊物品进口审批流程,实现进口特殊物品“进得来、通得快、管得住”。

苏州自贸片区集聚着一大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创新型企业,2022年苏州自贸片区全年进出口7151.25亿元。片区通过优化监管集成创新,推动多项自主改革创新落地生效,有力激发了产业升级新活力。

同时,苏州自贸片区还携手园区海关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助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司法公证销毁+区块链存证”项目,为友达光电等集成电路企业节约运营成本超过720万元;全国首创“长三角海关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协同模式”并获海关总署复制推广,目前已有18家企业参与试点,累计实施查验协同117票,涉及货值1.13亿元,为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约800万元;持续优化“空运直通港”快速通关模式,推动长三角物流一体化,减少口岸机场监管仓库理货环节,通关提速6小时,降低仓储运输成本约20%;支持园区港作为起运港/目的港开通外贸集装箱航线,实现与洋山港等一线港口的互联互通。

而此前,药明巨诺已然通过长三角区域特殊物品风评结果互认改革试点,享受到了自贸区制度创新带来的红利。该模式通过评估结果共享互认,解决了同生产商、同种特殊物品在不同关区需重复实施风险评估的难题,审批手续压缩至1个工作日。

自贸试验区是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平台,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苏州自贸片区“敢”为人先,持续将制度创新的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新的一年,片区将牢记探路、引领、突围的使命,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实施三年行动计划,落地更多系统集成性突出、市场主体获得感强的制度创新成果,以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的担当作为持续提升建设水平。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自贸片区以监管集成创新撬动产业发展

■ 唐晓雯

投资环境

2022年全球 初创企业数量增速放缓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报道,全球初创企业增长速度已经放缓。2022年新诞生的独角兽企业只有258家,新增数量与2021年相比下降五成。多国央行纷纷上调利率和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经济减速的担忧情绪加剧,初创企业获得的投资也大不如前,独角兽企业迎来了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报道称,特别是2022年下半年减速势头不断加强。2022年10到12月间,新增独角兽企业仅为19家,同比大降86%。从地区分布来看,美国2022年新增独角兽企业仅为152家,降幅达52%;欧洲为46家,下降29%;亚洲新增45家,降幅达到63%。全球初创企业的融资总额也降至4151亿美元,降幅达35%,三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德国数字经济 产业保持快速增长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德国信息、通讯和新媒体协会(Bitkom)日前发布的年度行业报告指出,2022年德国数字经济行业营收将首次突破2000亿欧元大关,预计2023年将再同比增长3.8%,营收达到2034亿欧元。在各子行业中,预计IT业增长最快,预计2023年IT业营收为1264亿欧元,同比增长6.3%。其中,软件销售额达到388亿欧元,增长9.3%;硬件销售增长5.3%至397亿欧元。智能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将增长15.3%至34亿欧元;而个人电脑的销量会略有下降。受高通胀和经济下行预期影响,消费电子产品和电视机市场需求将会明显下降,许多消费者开始节约支出,并避免进行类似的大宗采购。

约旦南部蕴含 丰富且易开采的硅砂资源

据佩特拉通讯社近日报道,约旦能源和矿产资源部报告称,约旦南部高纯度硅砂资源丰富且开采简便,其中马安省高纯二氧化硅硅砂储量达120亿吨,每年可产2.2万吨供当地市场,为国际国内投资者提供强大吸引力。2021年约旦全国共生产6.88万吨高纯二氧化硅。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表示,2022年2月开始,该部针对当前国际市场对纯度超过99.9%超纯硅矿石需求加大,将对本国硅矿石开展重新测量和评估工作,目前南部Dabbet Hanout和Ras Al-Naqab地区二氧化硅矿石纯度已达到99.62%,未来通过洗涤、研磨、筛分和磁分离技术,纯度有望提高至99.9%以上。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春节过后,贵州省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复工复产,按下项目建设“加速键”。通过加强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补链延链强链等举措,贵州省确保2023年推进实施重大项目4000个以上,完成投资8000亿元,为新的一年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普华永道落户南沙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寒梅)普华永道咨询服务(广东)有限公司2月6日在南沙完成开办企业的登记注册,标志着普华永道在广东的咨询总部正式落地南沙。

记者了解到,去年出台的《南沙方案》从国家层面加快推动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南沙有望从地理几何中心转变为大湾区的经济功能中心,发挥更重要的枢纽作用。从加快广州期货交易所、大湾

区国际商业银行、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等重大平台建设,到南沙每年举办国际金融论坛、大湾区科学论坛等高端国际会议活动,都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内外联通和融合发展的土壤。

普华永道中国区域经济及南部市场主管合伙人张立钧表示,作为全球最大专业服务机构之一,普华永道在大湾区的各成员机构一体化

运作有利于整合粤港澳三地专业力量,拓展服务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向业务,为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专业服务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普华永道近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业务增长明显。以南沙为例,在政府服务方面,其为南沙发展改革、商务、税务、投资促进等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并签订长期合作战略协议;

在企业服务方面,为智能网联汽车、生命科学与健康以及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数据安全咨询、ESG可持续发展等创新服务。与此同时,普华永道还将推进筹建粤港澳产业创新研究院等新型智库和大湾区青年服务基地等工作。

此外,在普华永道咨询服务(广东)有限公司落户南沙的当日,香港工商及其他社会团体代表与广州市

多个协会代表、企业代表共同参加了“穗港商协会协作交流活动”。张立钧在活动中表示,普华永道是参加交流会最年轻的南沙企业,选择落户南沙,是普华永道中国积极服务大湾区建设、落实《南沙方案》的重要决定。期待落户南沙之后,普华永道与穗港两地的政府、企业和商协会各界保持紧密交流,共同为两地往来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

经贸会客厅

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

外企决策考量因素增多 引资还需更多换位思考

■ 本报记者 张凡



零点有数董事长 袁岳

在去年面临多重挑战的压力之下,我国引资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再创历史新高,首次超过1.2万亿元。而今年,我国吸收外资面临的形势依然是非常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跨国投资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超大的规模市场、完备的工业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等构成的引资综合优势在不断强化。这对广大外国投资者来

说,依然是来华投资的理由。

“中国对国际投资项目的吸引力还是有一些明显优势的。”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举例说,由于多类产业甚至非常深度细分产业的供应链本地化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外企供应链总体成本;中国拥有发达且覆盖面广的基础设施,物流行业发展迅速,这使得企业物流成本可控性程度不断提升;中国还拥有具有一定熟练度和可塑性的劳动力群体;地方政府求商若渴,对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招商引资业绩的积极性非常高。

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推出了不少举措,坚持市场准入平等、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清理涉企收费等等,提高了外企的获得感。

“如果我们服务外商都达到特斯拉落户上海的效率水平,这样的营商环境好不好?如果这是一个对所有外商都适用的普惠做法,或者这只是对于外商中达到一定规模和行业门槛企业的普惠做法,或者这是各类所有制企业都适用的普惠做

法,那么这一做法被企业认可的程度就会不同。”袁岳观察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的同时,一些制约外商投资的因素也更为明显,特别是国内外政策性制约因素在明显增加。

“外企在中国投资时,技术含量和创新度高的项目受到其他发达国家制裁和限制的因素会持续增加,而技术含量和创新度没那么高的项目得到政策支持与政府重点服务的可能性有限。当前,外商在华投资比较有可能的,恰恰是并不在中国政府优先鼓励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技术范围的项目。比如,今年德国企业在华新增投资项目多与重化、机电、电子消费品等有关,而非政府鼓励政策中提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兴生物医药技术、新能源等产业类项目。”袁岳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比较吻合本地条件和基础的产业更新、优化、提升给予的考虑偏低,投放的资源支持偏少,对应的外商投资释放的欢迎信号偏弱,这就导致了普遍的“想做的招不到,能做的眼不瞧”的局面。

袁岳认为,我国的营商环境存在着以下短板:一些地方产业尤其是新兴的深度细分产业中,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低,企业影响、参与或者直接进行职业人才培养的制约机制多,这都增加了外商对投资项目中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源成本、落地成本的担忧;显性税费成本高,这会抵消一部分政府在谈判中给出的退税、税收奖励、资金支持政策等优惠条件带来的红利,况且由于地方政策相关资源获得设置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这种政策沟通技能和意愿并非外商投资企业的强项。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岳认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需要换位思考,了解外资企业的习惯。比如,外企大多使用专业服务机构帮助他们处理大部分需要与官方、合作伙伴、同行打交道的事宜,而不是去找政府官员或机构直接处理相关事项,这就需要促进专业服务机构发展;在争取商业资源和政策资源,特别是获取优惠利率贷款、政府采购或者其他公共采

购竞标机会、政策资金支持的时候,外企可能会感受到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距离,这就要在这些领域对外企企业一视同仁;外企在政府要求其配合实施一些行政措施时,他们的理解与反应会比较慢,政府机构要给予宽容和理解。

“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合作时常常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当下,规模较大的企业、知名企业间的合作项目可能容易被注意。因此,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还应充分鼓励外企与民营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的合作。项目合作也可以采取多项目分散合作、非敏感应用领域广泛合作、境内外分置合作等方式,减少公开名单、过度突出外企项目中的核心技术分布等做法,替外企分忧。”袁岳表示,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优化营商环境时,不仅要对标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标、我国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还要根据外资企业在其特定产业、特定来源地、产业链中所处的特定地位来综合考虑,从而不断提升营商环境的吸引力。